

書名：《考文叙事錄——中國現代文學文獻校讀論叢》

作者：解志熙

出版：北京：中華書局

出版日期：2009 年 4 月

頁數：405 頁

在當代中國的學科體系中，現代文學研究早已有“顯學”之稱。幾十年來，無論理論方法的革新抑或研究領域的拓展，均展示了許多值得稱頌的實績，一些標誌性的著述我們亦耳熟能詳。可以想見，在此形勢下，如何突破“影響的焦慮”而另闢學術新路，不能不說是擺在學人面前的一大挑戰。新近出版的解志熙的《考文叙事錄——中國現代文學文獻校讀論叢》可算這方面的大膽嘗試。

作為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一綫學人，作者崛起于八十年代中期。適逢改革開放，西學如雨後春筍般涌入中國，這些異邦思潮對學術界的衝擊，真可用“道術已為天下裂”形容之。作者的博士論文《生的執著——存在主義與中國現代文學》就是彼時學術氣候的產物。此書考察存在主義哲學思潮對中國現代作家的影響，屬於正經八百的“比較文學”，將史料鉤沉、文本細讀、理論詮釋融為一體，其關於魯迅、錢鍾書、馮至、汪曾祺的論說，迄今仍是此領域中最有價值的參考。歷經七年的沉潛，作者推出第二部專著《美的偏至——中國現代唯美——頹廢主義文學思潮研究》。在這本面目全新的作品中，作者博稽詳考西方唯美—頹廢主義思潮在現代中國的跨文化運動，及其在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等文體中的不同程度的滲透。此書仍與“影響研

究”沾親帶故,但實已超越了早期著述的“理論演繹”加上“文本解讀”的研究模式,在文學思潮的起伏漲落之辨證運動中牢牢把握住主題與問題的所在,於整理浩無涯涘的原始史料中體現出驚人的誠意、細緻和耐心。從《摩登與現代》開始,解氏本著“獨立準備資料和獨立思考問題”的為學態度,堅持在歷史流變中發現文學的蹤迹,突破了畫地為牢的“純文學”研究而邁向前景廣闊的“實存分析”。

《考文敘事錄》凝聚了作者近年來對現代文學的思考,其中揭示的“校讀批評”的理論與實踐、“實存分析”的實驗,對當下學術界的啟發,所在多有。作者標舉的“校讀法”針對現代文學的史料特徵,而又努力使之從傳統文獻學中蛻變生發為切實可行的文學批評方法。蓋自晚清以降,隨著都市消費文化的繁盛、印刷資本主義的興起、新式教育的普及、讀書市場的擴大化,文學作品在生產、發表、流通、消費等各個環節上都大大加快了步伐,報章、雜誌不擇地而出,沛然莫之能禦也。但是,由於作家的手稿有潦草、不規範和筆誤之處,加上趕稿的匆忙草率和校對的粗劣,這樣就使得“許多現代文學文本從初刊本或初版本開始就留下了不少令人惋惜的文字訛誤問題,而在此後或者未能結集、再版,或者即使結集、再版,也很少能得到認真的校正”。(第1頁指該書,下同)如果再加上作家出於商業市場的考慮或者因應政治環境的變化而一再刪改文稿,現代文學文本的校勘,不僅是當務之急而且幾乎需要從頭做起。作者藉由個人整理文獻的甘苦經驗,細緻地例示了一系列校注問題,從“文字訛誤的本校與理校”到“文本錯簡的校訂和舊文獻電子化的新錯版問題”,從“‘外文’、‘外典’及音譯詞語的校注”到“‘今文’與‘今典’的考釋”等等,接著提供了一些切實可行的技術運用。然而我們也明白,西方學術中的“語文學”(Philology)對古希臘古羅馬的研究已積累了相當可觀的成就,中國傳統學術中的訓詁、校勘、注疏、版本學也形成了偉大的傳統,而且現代知識領域之分

化、重組與創新的複雜情狀又遠非前人所能想像。職是之故，解氏除了把原本屬於古籍研究的“校讀法”運用于現代文學文獻的整理與考訂之外，更致力於把“校讀法”推廣為一種行之有效的普適性的批評方法。這樣做的前提在於：文學文本固然是作者依靠想像力、情感和經驗而建構起來的客體，但讀者和批評家對於文本意義的把握，却不能穿鑿附會、天馬行空、隨意發揮，而必須在細讀文本的基礎上，傾聽話裏話外之音、挖掘紙背深意、發現文本互涉、參照歷史語境，如此才有望對作家意圖做出切實中肯的判斷。這正是“語文學”的方法。薩義德指出，語文學是對言詞和修辭的一種詳細、耐心的審查，一種終其一生的關注：“一種真正的語文學閱讀是積極的，它包括進入早已發生在言詞內部的語言的進程，並且使我們面前的任何文本中可能隱藏著的、或不完整的、或被遮蔽的、或被歪曲的東西泄露出來。那麼，從這種語言觀看來，言詞不是被動的標記和記號，謙遜地代替一種更高層次的現實；相反，它們是構成現實本身必不可少的一部分。”^[1]據此，作者告誡文學研究者：“有必要借鑒文獻學如校勘學、訓詁學家從事校注工作的那種一絲不苟、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與比較對勘、觀其會通的方法，而如果我們能夠這樣做，那也就有可能將文獻學的校注法引申為批評性的校讀法——一種廣泛而又細緻地運用文獻語言材料進行比較參證來解讀文本的批評方法或辨析問題的研究方法。”（第18頁）不僅如此，敏銳的讀者會發現，這種富於創造性而兼具可操作性的批評方法有多重的靈感源泉，除了古典學術的影響與師長彭鐸先生的啓發之外，書中還躍動著朱自清《〈詩言志〉辨》、韋勒克《近代批評史》的清晰面影，一些章節也呼應著奧爾巴赫《摹仿論》、史皮澤《語言學與文學史》的思考方法。顯然，博采衆長與轉益多師的結果，使得此書既有傳統學問的博雅，又有現代學術的邃密。

所以，書中大部分篇章冠以“選輯”、“輯考”、“考述”、“輯存”、“輯校”、“鉤沉”、“拾遺”之名，也就是“理有固常”了。實

際上,這些論文牽扯的不僅是字句段落的校訂、不同版本的對勘或者佚文的整理這些瑣碎的技术工作,而且囊括了互文篇目的追蹤、作家生命史的重播、文壇情形的勾勒以及文學史的再審視,既有沈從文、汪曾祺、林庚、梁宗岱等知名作家,也有劉夢葦、吳興華、葉公超、劉延陵之類的邊緣人物,涵蓋小說、詩歌、戲劇、散文四大文類。作者得心應手地運用“校讀法”和“校讀批評”,涉及了現代文學的重大問題,補充、深化和刷新了文學史圖像。例如,作者發現宗白華佚文《詩閒談》繼承和發展了他早年的詩論《新詩略談》,辯駁了浪漫主義詩學對抒情的偏重和對靈感的神化,重申技藝歷練、體驗深化和知識積累之對於新詩創作的重要性;劉延陵的《詩神的歌哭》微妙地顯示了文學研究會內部的詩學分歧;《〈孤鴻集〉自序》披露出短命詩人劉夢葦之建設一種“詩的原理與批評”的詩學宏願;梁宗岱佚文《釋“象徵主義”》證實了他與梁實秋在如何理解“象徵主義”詩學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而“葉維之是誰”的考證又牽動著當代學人對現代詩學中一樁公案的總體看法;林庚的數量巨大的集外詩文見證出他與戴望舒的詩學分歧不在於新詩的格律與自由之爭而在於詩的新舊之辯,他在執迷的探索之中完成了從20世紀(以下年代均指20世紀)30到40年代的詩學詩風之轉變。不僅如此。作者通過對於沈從文的系列佚文“廢郵”的鉤沉,指出早在30年代中期,沈氏對於“現代派”新詩的京、海差異就有了洞察,而在40年代中後期,沈的“鄉下人”經驗與其“自由派”政治立場共同局限了他,也在他的文學文本中清晰地呈露出來。再比如,學術界自80年代以來一直把汪曾祺推譽為最後的京派小說大師、津津樂道他如何受到沈從文的強勢影響,但是解氏透過對於汪曾祺早期作品的拾遺和校讀,洞察到多樣化的嘗試彼時已存在,從《燈下》到《異秉》的文本演變顯出作家的成長與得失,汪的文學起點除了受到沈從文影響之外,其實與廢名有更深的傳承,他不僅屬於“京派”而且與“現代派”結緣——這些看法誠可謂“別具

隻眼”。再比如“知性散文”的問題。關於中國現代散文的著述，多則多矣，但只有解氏敏銳地發現了這個新類型的存在，所以“知性散文”的發明權應該歸屬在他的名下。解氏認為，“五四”文學革命時期產生了“批判性的隨感錄（雜文的前身）”和“藝術性的美文（隨筆或小品）”這兩個散文類型，但是所謂藝術性散文并不止於“敘事與抒情”而已，其實還存在一種不離經驗而又深化經驗、洋溢著智慧風度和書卷氣息的新類型，那就是從20年代的梁遇春、朱光潛開始，中經30年代的溫源寧，到40年代由梁實秋、錢鍾書、馮至、李霽野、楊振聲等人踵事增華的“知性散文”。在抽樣考察了這種散文的代表篇章之後，作者從現代散文發展史的角度總結了它在40年代崛起的重大意義：“它有力地矯正了被雜文的刻薄褊急、情調散文的感傷煽情和幽默小品的輕薄玩世所左右的30年代文風，恢復了中外散文藝術之深思明達、純正博雅的傳統，不僅拓展了現代散文的藝術天地，而且深化了現代散文的思想境界。”（第346頁）實良有以也。

中國現代文學雖只有短暫的三十年，却造就了數之不盡的作家、作品、社團、流派、報紙副刊與文藝雜誌，有幸進入“文學史”者只不過是冰山一角；所以，通過披沙瀝金的文獻功夫，挖掘一些學術界未曾得見的史料，也不算太大的難事。關鍵在於：如何不被浩如煙海的史料所淹沒而清晰準確地彰顯合乎文學史實際的判斷？如何才能驅遣自如地利用史料、揭示出重大的問題從而有力地推動現有的研究？這就要求研究者具備淹博的“知識結構”、謹嚴的“學術識斷”和開放的“文學趣味”。《考文敘事錄》的系列“校讀札記”，關於40年代話劇文學、知性散文和張愛玲在淪陷時期的文學行為這三個“敘論”，就是最佳例證。作者避免史料的一味羅列、堆砌和敘述，緊緊圍繞中心議題而從容地篩選、駕馭和解讀史料，勾勒文學現象的總體特質而又不忘差異性的存在，在充滿歷史感的論述中揭出自家的判斷，既

綱舉目明,又要言不煩,既大氣磅礴,又厚實綿密。例如《“戲劇春秋”的輝煌一紀》處理的是抗戰及40年代的話劇文學,作者廣搜旁求的功夫令人贊嘆,但作者的才具并不止此。他從大處著眼,以摹寫世態人性的“寫實劇”和感時猶國復憂人的“歷史劇”結構章節、展開行文,顯出高屋建瓴的氣魄,復以經典文本的解讀貫穿全篇,把紛繁的文學現象轉化為井然的邏輯綫索。作者還注意到,即使“寫實劇”也不是鐵板一塊,而此外還存在著以陳詮為代表的“浪漫的情節劇”和以吳祖光為代表的“抒情的情調劇”;所謂歷史劇其實又存在著“民族危亡史劇”、“亂世整合史劇”和“農民起義反思史劇”等相對不同的類型,三者既有區別,又相互交織;而無論何種歷史劇的寫作,都起因於作家之時時在心的現實政治問題和在所難免的人文思考。至於如何評介歷史劇之借古諷今的傾向,作者有意辯難海外漢學重鎮夏志清的看法——後者出於西方中心主義思維、政治意識形態偏見和純文學趣味而故意貶低歷史劇的意義——而作者堅持以歷史化的思考和人文主義的立場來理解這一現象,眼光自然高人一籌了。

大體而言,《考文叙事錄》提出了兩個具有“方法論”特色的研究模式:一是兼采文獻學與文學批評、立足於技術運用的“校讀法”,二是溝通內部研究與外部研究、具宏觀指導意義的“實存分析”。80年代以來,“新批評”理論被譯介到中國,學術界出於對庸俗社會學方法的反撥和對於學術尊嚴的自覺追求,轉而把文學文本視為獨立自足的客體,把發掘修辭技巧和美學特性視為文學的中心任務。在這種“純文學”觀念的支配下,學術界偏重於文學的“內部研究”,當然也有值得稱贊的佳作出現。但是,晚清以來的中國文學本來就是現代歷史文化的組成部分,“內部研究”不免有畫地為牢之虞,對文學現象之歷史性的起承轉合和興廢輪替難有切當的判斷。乍看起來,這似乎是“卑之無甚高論”的常識,然而,在頻年作論、話語絡繹的當下學術界,

“常識”又豈無“捍衛”之必要？《考文敘事錄》的作者具備辨證的精神和健全的歷史理解力，他早已體認到“方法，在綜合中達到互補”，對於“純文學”和“內部研究”的盲點保持一貫警惕，堅信“文學是一種最具主體的實存行為”，自覺把“實存分析”落實到自家著述之中並且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績。《摩登與現代》一書的副標題即以“中國現代文學的實存分析”名之，可見其學術依歸之所在；而他對於抗戰及40年代新詩潮源流的重新梳理及對小說創作殊途同歸於“分析”動向的把握，對於“左翼現代主義者”艾青的論說，對於作為“現代中國生活樣式的浮世繪”之師陀小說的敘論，在在見出“實存分析”的嫻熟運用。

《考文敘事錄》中的《亂世才女和她的亂世男女傳奇》是這種方法論的典範。此文長達六萬餘字，對張愛玲在淪陷時期的文學行為進行了細緻周密的考察，把似成顯學的“張學”研究推進到一個新高度，有力地解構了海內外學人聯手打造的“張愛玲神話”。自夏志清“發現”張愛玲以來，對這位作家的研究如火如荼，甚至有逸出學院高牆、轉化為大眾文化的趨勢。加上文化理論的隨意揮灑，中外學者的“造神”運動愈加賣力，於是，“天才奇女”、“舊上海的最後一個貴族”等雅到俗不可耐的高帽紛至遡來。解氏的研究兼具理性的批判精神和感性的同情心，他通過與魯迅、路翎的人生經歷的比較，指出“家敗”和“世亂”的生活經驗形成張愛玲早熟敏感的心理，導致她缺乏感時憂國情懷和現代國民意識，舊家庭的生活氣氛和教會學校的殖民教育影響了張愛玲為文以至為文的態度。那麼，置諸中國現代小說的發展脈絡來看，張愛玲小說的“好處”究竟體現在哪裏而其“局限性”又何在呢？解文沒有面面俱到展開論題而是以代表張氏小說創作最高成就的《傳奇》為樣本，圍繞著兩個最為醒目的向度分析來論證之：一是傳寫末世人性之變與亂世人情之常的“敘事焦點”，二是反傳奇的傳奇之“敘事藝術”。一般學者看到了張愛玲之溝通新舊、相容雅俗的藝術抱負，但這種“共識”

失之於籠統,而解氏進一步具體分析了張愛玲特有的“抓大放小、俗事文講、凡中求奇、參差對照”的敘述策略,並聯繫到中國現代小說的演進脈絡、西方電影的現代羅曼司敘事風格來深一層進行對比論述,他認為正是這些方面構成了一種超越舊派通俗小說和新派寫實小說的“反傳奇的傳奇”,這種敘述藝術更因為糅合了本土文學傳統和外來流行文化,取得了雅俗共賞、新舊皆宜的接受效應。如果說,上述兩章還局限于“文本細讀”的操演和“微觀詩學”的追蹤的話,那麼,接下來的兩章就過渡到了廣闊的歷史視野和文化參照,真正把“實存分析”的潛力發揮得淋漓盡致。關於淪陷區文壇上的張愛玲之爭,解氏在還原歷史語境、校讀原始文獻的基礎上,細緻入微地呈現出相關人士的言語行為之間的互動關聯以及他們的應和或分歧在當年文壇的深層寓意。讓人印象尤深的是,作者對於傅雷、柯靈如何出於愛才之心而對於張愛玲發出不忍明言的勸告,熱戀中的胡蘭成如何對於張愛玲惺惺相惜和獎掖抬舉,張愛玲究竟是該“應有鬥爭”還是“但求安穩”,在這些問題上解氏對於雙方的心態和動機都有絲絲入扣的解讀。在全文的第五章中,作者通過挖掘和細讀一些不為人知的珍稀史料,結合淪陷區文壇的複雜情形、胡蘭成的政治活動和文學行為、張愛玲戰中戰後的創作經歷、近來學術界研究的迷失、以及現代文學中“人的文學”之歷史流變,深入、周密地揭示了掩映在張愛玲小說之“婦人性”的人性宣敘中的妥協迷思,可謂難得一見的“大手筆”。

此外,《考文敘事錄》的文風亦值得稱道。在為奧爾巴赫的經典《摹仿論》寫就的長篇導論中,薩義德精準地指出:“即使在英語譯文中,奧爾巴赫的風格特徵也是一種沉著的,有時甚至是高傲、極度冷靜的語調,傳達出從容澹定的博學,以及與之結合在一起的對於他作為學者和語文學家之使命的一種壓倒一切的耐心和一往情深的自信。”^[2]多年以來,解志熙醉心於奧爾巴赫的語文學,在博稽群籍的《考文敘事錄》中,讀者同樣可感受到

這種風格。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張松建

注釋：

- [1] 愛德華·W·薩義德：《回到語文學》，見薩義德著，朱生堅譯：《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69—70頁。
- [2] 愛德華·W·薩義德：《艾里希·奧爾巴赫〈模仿〉導論》，見《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第103頁。按：奧氏此書的中譯本名為《摹仿論——西方文學中所描繪的現實》（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譯者為吳麟綬、周新建、高豔婷。